

藏巧於天然之中

● 布莉莉、郭全照



閻連科：《四書》(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11)。

如何在概念化、符號化的歷史敘述模式中，尋找到自己獨特的言說方式，擺脫既定的陳詞濫調進入深度寫作的畛域，是中國多數有擔當的作家縈繞在心的寫作情結。閻連科《四書》(引用只註台灣版頁碼)敘述的時空刻度仍然聚焦於共和國史上的傷痛與恥辱——大煉鋼鐵、大躍進運動、大饑荒。我們所關注

的是閻這位敢自稱「寫作的叛徒」(參見〈後記〉，載閻連科：《四書》[親友贈閱版]，頁229)的寫作者，這次為我們烘焙出了怎樣口味獨特的精神食糧？在公共化的歷史寫作模式之外又提供了怎樣的異質美學奇觀？

一 結構：「書摘接力體」

《四書》由《天的孩子》、《故道》、《罪人錄》和《新西緒弗神話》四個「次文本」連綴而成，是一部「書摘接力體」小說。全書共十六章，每一章節或由一部書構成，或由幾部書組合而成。其中敘事的主體是《天的孩子》和《故道》，佔全書的大部分；《罪人錄》只是散點式地穿插其間；而《新西緒弗神話》作為全書的最後一章是一部簡明的哲學隨筆，雖然只有幾千字，但卻是解讀整部小說的關鍵。

閻連科在最後一章親自現身，煞有介事地向我們解說這四部書的由來：「而《天的孩子》這一本，是我幾年前在一個舊書攤上買到的，作者的署名處，寫着這樣兩個字：佚名。出版者是中國典籍神話出版

《四書》是一部「書摘接力體」小說，然而此種文體設計並不突兀，四部書之間相互接續、對照、補充、呼應，從不同層面和角度豐富並推動敘事，故事進展的線索奇妙地在四部不同的書之間跳躍、起伏、傳遞。

社。」(頁374)《故道》是書中人物「作家」所寫的近五百頁的紀實書，是一部小說的素材和記錄，直到2002年才出版。《罪人錄》是「作家」向「上邊」寫的關於育新九十九區「罪人」的點點滴滴，是一部揭發與告密之書，於1980年代作為歷史資料出版。《新西緒弗神話》是書中人物「學者」用紫藥水書寫的半部哲學隨筆文稿，並未出版和面世。然而巧妙的是，閻連科此種文體設計並不突兀，四部書之間相互接續、對照、補充、呼應，從不同層面和角度豐富並推動敘事，讀來節奏起伏，流暢清晰，有種明麗的快感。

比如，在《天的孩子》裏，「宗教」和「孩子」帶着煉好的五星鐵，到省裏參加獻鋼送鐵的大會評比，在路途中遭遇了一道怪坡——上坡的時候一點也不費力，下坡的時候卻阻力重重；而到了最後一章《新西緒弗神話》中，「怪坡效應」的出現因為有了前面的鋪墊才不顯得突兀，並獲得了更深的寓意。再比如，在《天的孩子》裏，「學者」、「音樂」的姦情最終敗露，被「上邊的人」帶走了。但是告密者到底是誰？在接下來的《故道》中，才最終揭曉了答案——在《故道》的敘事軌道裏，「實驗」最先發現「學者」和「音樂」的曖昧關係，以瘋狂的努力要捉姦立功，並因此帶動了其他「罪人」紛紛出動。其實，早在《罪人錄》裏，「作家」就已向「孩子」披露了「學者」和「音樂」的曖昧關係。這樣，讀者隨着敘事腳步的深入，獲得了一種如讀偵探小說般的懸疑快感。故事進展的線索奇妙地在四部不同的書之間跳躍、起伏、傳

遞，保持了故事之河的順暢流動，一種搖曳多姿的美感油然而生。

如果說《故道》是知識份子的紀實與自白之書，多少還秉承了自由書寫的血脈的話；那麼，《罪人錄》則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揭發與告密之書，是當時政治環境壓迫和人性扭曲的產物。相比這兩部書，飽含天啟、神諭意味的《天的孩子》以及富有哲學、寓言意味的《新西緒弗神話》，則是最能體現閻連科長期以來的敘事追求和思想探索的，即以創新的語言和敘事表達中國獨特的歷史真實。這四部書彼此映照、相互扶攜、從各個聲部豐富了敘事的歷史時空，顯得豐贍、富饒。

二 語言：行吟的迷醉

閻連科是一位有着自覺語言意識的作家，他曾表示：「我經常跟別人說，對我來說，最難的寫作是『語言』，我一直都在尋找屬於我們自己的小說語言。」(參見李陀與閻連科對話錄：《〈受活〉——超現實寫作的新嘗試》，《讀書》，2004年第3期，頁53。)他的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堅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風雅頌》等作品都力圖在語言運用上做出嘗試，尋找一種他心目中理想的表意方式。到了《四書》，我們可以說，他的探索得到了語言繆斯的回報，使漢語穿上了新質的鞋子，行吟般滌蕩大地。

《天的孩子》的語言風格總體上來說是浪漫主義的、詩意的，讀來如誦唱歌謠般令人迷醉，我們不妨來看看瀾漫其間的氛圍：

相比《故道》和《罪人錄》，飽含天啟、神諭意味的《天的孩子》以及富有哲學、寓言意味的《新西緒弗神話》，則是最能體現閻連科長期以來的敘事追求和思想探索的，即以創新的語言和敘事表達中國獨特的歷史真實。

大地和腳，回來了。

秋天之後，曠得很，地野鋪平，混蕩着，人在地上渺小。一個黑點星漸着大。育新區的房子開天劈地。人就住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地托着腳，回來了。金落日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光亮粗重，每一桿，八兩七兩；一桿一桿，林擠林密。孩子的腳，舞蹈落日。暖氣硌腳，也硌前胸後背。人撞着暖氣。暖氣勒人。育新區的房子，老極的青磚青瓦，推擠着年月老極混沌的光，在曠野，開天劈地。人就住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光是好的，神把光暗分開。稱光為晝，稱暗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上。這樣分開。暗來稍前，稱為黃昏。黃昏是好的。雞登架，羊歸圈，牛卸了牠的犁耙。人就收了他的工了。(頁30)

不難發現，閻連科在《天的孩子》裏開掘的語言氣象混沌如創世之初的「天地玄黃、宇宙洪荒」，有種陌生與新奇的氣質。它不僅融雜了《聖經》語體、民間說唱等語言資源，而且句子結構變幻多端，收放自如，用詞奇崛、詰聲，常有出人意表之處。單音節字、短句的運用使節奏富有韻律。名詞動詞化、反復等手法的運用，使得白話語言散發出陌生與莊重的氣質。這讓人聯想到漢語和合本《聖經》的語言特點就是基於口語、簡潔硬朗、淺白易明、質樸古雅，它較少使用長句、從句，而多用短句，主要通過反覆申說和使用隱喻來表情達意(參見陳鐺：〈漢譯聖經與文學革命之分途——以《和合本》為中心的考察〉，《孝感學院學報》，2010年第2期，頁36-40)。

閻連科應該是對《聖經》極為熟稔的，他在《受活》、《丁莊夢》中就曾使用基督教意象，也力圖在寫作上做出嘗試。閻曾說：「如《聖經》的語言，你仔細去琢磨，在許多地方，它每句話都能給人帶來韻律，帶來震撼，非常質樸，但卻很有意味。」(參見閻連科、梁鴻：《巫婆的紅筷子：作家與文學博士對話錄》〔瀋陽：春風文藝出版社，2002〕，頁81。)在《四書》當中，他吸取這條文學血脈的滋養，並將其運用得更為成熟。

《四書》中如上的句子不勝枚舉，俯拾即是。顯而易見，閻連科在語言上進行了一種新的煉造，就像小說中所謂的從黑沙裏煉出鋼鐵一般(頁120-21)。這種新的語言文辭跳宕，風格尖銳峭拔而不失華美，以一種陌生、冷峻的鋒芒硌疼了「習慣文學」的讀者的眼睛。閻這種「變節的筆墨」以其在長篇幅內營造的特殊腔調和韻味，展示了一種「新漢語」的可能性。

三 哲思：救贖的「怪坡」

雖然書中的人物都是以身份或事物等來命名，如「實驗」、「學者」、「作家」、「音樂」、「宗教」等，但巧妙的是這些人物都是鮮活的、有血有肉的，一點也不抽象化、概念化、符號化，都有具體而微的人性，生動可感。倒是以年齡命名的「孩子」，始終帶着某種原始誘惑與神秘的氣質，飄忽不定，形成闡釋和言說的黑洞。閻連科在接受《亞洲週刊》採訪時表示，「孩子」是貫穿整部《四書》中最為精彩、複雜的

閻連科吸取《聖經》這條文學血脈的滋養，並將其運用得更為成熟。閻這種「變節的筆墨」以其在長篇幅內營造的特殊腔調和韻味，展示了一種「新漢語」的可能性。

「孩子」與「宗教」所構成的關係，使讀者可以感到中國正因為沒有宗教，才充滿着缺少宗教的不安和焦慮。與其說《四書》寫了宗教，不如說是寫了因為沒有宗教而給這個國家、民族和人類帶來的災難和不安。

人物，他「亦真亦幻，亦正亦邪，充滿了天真的惡和醒悟後的善」（參見《亞洲週刊》對閻連科的採訪，豆瓣網讀書，www.douban.com/note/183032556/）。這個人物身上因為寄寓了太多作者對人性、文化、人類命運的思考，而愈發顯得難以捉摸。

在《四書》中，「孩子」是育新九十九區的「酋長」，管理着127個「罪人」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高級知識份子。「孩子」對大的時代形勢、社會變局並不明白，只是懵懂地執行「上邊」下發的政治任務，並不知其為惡。一開始，他只是為了給自己爭名次、要榮譽，而動員「罪人」積極勞動；「罪人」的勞動成果幫他獲得不斷升級的榮耀，他也知恩圖報，給「罪人」發小紅花。在有人不聽令時他會撒潑耍賴，動不動就要人家鏟了自己、斃了自己，而不是暴虐對待「罪人」。一方面，他身上有着一般孩童的「單純、透明、天真」，對世界和榮譽充滿好奇；另一方面，他也不乏成人的世故、老到和精明。他實行紅花、五星制度，對「罪人」進行獎懲，以便於管理。他以「音樂」來要挾「學者」參加煉鋼，因為他知道「學者」愛着「音樂」。他鼓勵「作家」及他人向他揭發和告密，如揭發「音樂」和「學者」的姦情，使二人受到批鬥。但他所做的這一切的出發點只是一個孩子的私心和好奇，始終不曾狠心得要虐害他人。

至於最後「孩子」走向十字架，則是這個小說最具開放性和闡釋空間的地方。我們可以認為「孩子」是在「宗教」的影響下，具有了像耶穌、聖母瑪利亞那樣的大悲憫情

懷；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強烈的「英雄情結」使然。文本中曾有幾處提到「孩子」具體讀過的書，一次是「作家」去找他，發現「孩子」正在屋裏看他的連環畫——連環畫上是革命的游擊戰爭故事（頁224）。文本中也多次提到「孩子」嚮往當「國家英雄」，不惜犧牲生命。再就是，「宗教」上交給「孩子」的聖母瑪利亞畫像、《聖經》（頁289、369）。「孩子」不曾受過任何正規的教育，這兩類書應是他主要的思想資源。在閻連科的筆下，「孩子」無具體年齡、無身世背景，悄無聲息地來，卻轟轟烈烈地走，如《四書》序論中所說：「他的死不見得是一種屈辱的救贖，也可能是一個對社會主義理想的殉節，藉此他將永垂不朽（immortalized）」（參見蔡建鑫：〈屈辱的救贖：讀閻連科的《四書》〉，頁16。）

閻連科在接受《亞洲週刊》採訪時說，「孩子」與「宗教」所構成的關係，使讀者可以感到中國正因為沒有宗教，才充滿着缺少宗教的不安和焦慮。對於《四書》，與其說它寫了宗教，不如說是寫了因為沒有宗教而給這個國家、民族和人類帶來的災難和不安（參見前引《亞洲週刊》採訪）。但閻所說的宗教倒不一定就是小說中過於明顯的基督教指涉。

在最後一章的《新西緒弗神話》中，西緒弗上山推石遇見了一個「單純、透明、天真」的孩子，激發了他的「愛和情感」，給他帶來新的存在意義，成為了循環往復的懲罰生活中的希望和光亮。但此一重寫的希臘神話卻經過了巧妙的改裝，西緒弗遭受「怪坡效應」的新懲處：

上坡時，石頭不用他推就自己向上翻滾，然而爬坡本身消耗體力；下坡時則更為艱難，彷彿地心引力頓然消失，他必須克服重力做功，拼命向下推動巨石才能完成這一過程。而且，「他見不到孩子了」、「見不到天山的光亮和星點了，他感到與神、天堂、精神背道而馳了」（頁378）。這乃是東方的西緒弗，但這個東方西緒弗在神對他的懲罰和現實的「禪院俗世炊煙圖」當中，找到了新的協調和「從適」（頁379）。

《新西緒弗神話》本是「學者」所寫，「學者」在「孩子」釘上十字架、眾人散去時主動留下，唯一要求的是「把你們抱的——有關佛的、禪的書，全都留給我」（頁370）。在佛教看來，人的本性就如那個單純、透明的孩子。《聖經》也說過，只有具備孩童之心的人才能上天堂。可以說，西方的西緒弗代表抗爭和形而上的一面，而在這個新神話裏，東方西緒弗代表順從和形而下的一面。這個故事的特出之處正在於孩子的形象，他超越了東西方的簡單對比，集合了閻連科對人性、文化之理想和希望的思考與寄託，而作者認為這將影響到我們歷史和文明的命運。

四 結語：疼痛美學

在當代文壇，閻連科可以說是有一位有寫作擔當和藝術勇氣的作家。從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年月日》、《堅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丁莊夢》、《風雅頌》一路走來，他不畏艱險，觸及敏感題材；扎根大地，書寫苦難與抗爭；回顧歷史，描寫政治的

荒誕殘酷；深挖人性，探尋救贖的可能。他又在藝術形式上孜孜以求，作品中荒誕奇異的故事情節、峭奇逆向的結構形式、奇特陌生的語言運用、神秘魔幻的敘事風格，每每給文壇帶來不小的驚喜。

《四書》仍是這種寫作腳步的延伸，且更大膽地撥弄黨國意志的神經：在書裏，閻連科寫共和國史上失敗的「烏托邦」實驗——大煉鋼鐵，以狂飆般的藝術想像力寫大躍進中用血種麥子的荒誕駭人，寫大饑荒中同類相食的人間慘相，寫知識份子面臨生存考驗時的人性複雜，皆驚心動魄、引人深思。雖然這種苦難和暴力的敘事已不鮮見，但是它卻觸及了一種內在真實。閻連科在其文學隨筆集《發現小說：文學隨筆》中將這種寫作稱為「神實主義」——「即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面邏輯，去探求一種『不存在』的真實，看不見的真實，被真實掩蓋的真實。神實主義疏遠於通行的現實主義。」（參見閻連科：《發現小說：文學隨筆》〔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11〕，頁181。）

然而，《四書》是否完全達到了他自己的期許？至少，小說中「孩子」這個形象讓人感到已接近寓言化的邊緣，「孩子」亦正亦邪，一方面是一個少年「法西斯」形象；一方面又單純、天真，甚至近乎聖潔。他一夜之間把自己釘上十字架，對「音樂」的主動獻身無動於衷，「孩子」的這些舉動都沒有合理的心理動機，或者分析出來也是前後矛盾，但卻有意無意地使「孩子」成為了一個寓言性的人物。閻連科宣稱其「神實主義」必須建基於「內真實」、「內因果」（閻連科認為「內真實」是

《四書》大膽地撥弄黨國意志的神經：寫大煉鋼鐵、大躍進、大饑荒，皆驚心動魄、引人深思。雖然這種苦難和暴力的敘事已不鮮見，但是它卻觸及了一種內在真實。閻連科將這種寫作稱為「神實主義」。

人的靈魂與意識的真實；「內因果」是小說在故事與人物的進程中，依靠「內真實」推動人物與情節變化的原因與結果，它不在現實生活中必然發生或可能發生，卻在精神與靈魂上真實存在。參見閻連科：《發現小說》，頁152、157-58），要與寓

言、神話劃清界限，因後者仍處於「外因果」（指外部世界〔社會、環境及他人〕的因素）的「套穴」之中（閻連科：《發現小說》，頁172-74）。「孩子」這個人物難道真的能跟寓言、神話劃清界限？這還是值得閻連科和研究者深入思考的一個問題。

隱去「黨史」的政治傳記

● 葉蔭聰

傅高義的《鄧小平時代》被內地各界如此看重，唯一的解釋大概是作者在東亞研究中的名氣。這本傳記給筆者第一感覺是，資料如此之多，細節如此豐富，但帶來的新認識卻如此之少。



傅高義 (Ezra F. Vogel) 著，馮克利譯：《鄧小平時代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2012）。

筆者一直不太明白為何中國大陸讀者對傅高義 (Ezra F. Vogel) 的《鄧小平時代》(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，引用

只註頁碼) 一書如此重視。2012年6月香港各大書店都以此書吸引內地旅客；據說，中國大陸還會推出稍加刪節的版本。傅高義在書的開首其實已明言，這本書主要是寫給美國人或所謂「西方讀者」看的，而非中國讀者（頁xi）。事實上，因為鄧小平對當今中國「政統」的重要性，有關他的論著本已是汗牛充棟。在筆者任教的香港嶺南大學，圖書館雖然較小，但討論鄧小平的著作也放滿了兩個書架，黨史專家、報告文學家、官方理論家也寫過林林總總的傳記作品。過去幾年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亦編輯出版了《鄧小平年譜：1975-1997》（北京：中央文獻出版社，2004）和《鄧小平年譜：1904-1974》（北京：中央文獻出版社，2009）。若考慮到國內受到官方理論及審查限制，以致相關傳記作品流於宣傳及討論不夠全面，海外也有不少屬禁書之列的作品可供選擇。